

双星同陨忆往事

○马识途（1945中文）

98岁的季羨林和93岁的任继愈两位大师同一天辞世了，双星同陨，这当然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所以各界深切哀悼，缅怀二老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追求知识真谛的人文精神。我虽也感到悲痛，却是哀而不伤。一则他们都寿逾耄耋，可算已尽天年，再则他们都以毕生之力，在各自的学术领域里，取得开创性的进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并且把学术成果，人格精神，薪火相传，已是后继有人，二老可以安息了。我无力写学术性文章追思他们，但我和他们二位都有几面之缘的往事，值得一说，从中或者足见他们的人品和文品。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后，我们这些从灾难中活过来的人，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更叫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如此众多的受害者却对之三缄其口，好像在中国从未发生这样的悲剧似的。我虽然不敢冒充历史学家，去全面地阐述这场悲剧的历史过程，议论得失，臧否人物。我却可以把那十年间亲身经历的人和事，老实地纪录下来，这便是我历十年之久写出来的《沧桑十年》。稿子写成以后，自然希望公之于众。于是我怀揣稿本到曾为我出版过几本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稿本交给编辑部，编辑看后，说写得不错，但最后是总编热心地和我谈了一回话，并请我吃一回饭，把稿子退还给



马识途学长和季老（左）

我。我知趣地抹了一下油嘴，怀揣稿本告辞了。作家出版社听说，叫我送去他们看看，过了一年，没有音信，我去信询问，他们说正在准备选择一个适当时机出版。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有时机降临到他们出版社，于是我收回了稿本，同时对他们已在这本稿本上作的编辑工作表示谢意。

1998年夏，我偶然读到季羨林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大为兴奋，感于他的空谷足音，我愿步其后尘。于是经过北大教授张光璠先生的介绍，揣着稿本和老友张彦到北京大学朗润园去拜访季羨林教授。

我是联大老校友，北大熟人不少，我常进出北大，我们一直到了朗润园。我没有想到，这么鼎鼎大名的教授，却住在朗润园底层很不起眼的几间房舍里。因为事先联系过，所以进门到了小会客室，季老已等在那里了。我们见面寒暄之后，直奔主题，我说明来意，读了《牛棚杂忆》，我愿步他后尘，我把《沧桑十年》稿本送他手上。他把稿本翻了一下，显然的他发

□ 怀念师友

现有人步他的后尘，有了同道，自然喜形于色，他答应“拜读”。我们自然地谈起“文革”往事来，话匣子一打开，我们一见如故，越谈越有同调，竟然过了一个多小时。他那平易近人，温文尔雅的学者谈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留连忘返。是朋友提醒，我才起身告辞。我说我有个不情之请，如季老以为这部稿子尚有可取，能否为我写一篇序言。他竟然表示考虑。

我回来不到半月，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季老不仅看完我这部三十几万字的稿子，还欣然答应写序，已经写好了，叫我去取。我听了不说是受宠若惊，那也是喜出望外。不觉叫出，季老真是有心人。我和女儿再度到朗润园，领取季老写的序言并登门求教。

他知道我是作家，并和他一同曾被聘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我只比他小三岁，可算同业同辈人吧，所以再见面，就像熟人一般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我们当然谈到“文革”，说到巴金老人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至今没有着落，连着说到巴金讲真话的事，不免说到讲真话之难。还谈到教育，说目前学术风气不大好。也涉及时政，却不想多说。我看他对许多事都有独立见解，令人钦佩。特别是说到中西文化交流，他反对“欧洲中心论”。他说东方文化包括印度文化一定会发扬起来，这就是他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点。

季老把他写的序言拿出来给我，我马上拜读，写得真好，讲理透彻，文笔生动，序末还写起诗来。季老给我序言稿，我的《沧桑十年》文稿本却没有给我，正

惊疑间，季老的助手李教授说，稿本被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编辑拿去了。他们到季老这里来，看到了这部稿子，说拿回去看看。我知道季老写“文革”的《牛棚杂忆》就是这个出版社出版的，如果我的《沧桑十年》他们能出版，那就太好了。

过一会，我说想参观他的书房，他叫李教授陪我去。小小的两间书房，满架满地都是书，擦到屋顶，几乎无插足之地。在这两间书房的临湖小窗下各放着一张不大的书桌，也堆了一些书，有的还翻开着。桌面中间铺着稿笺。李教授说季老每天清晨4时，必定起来写作，很少间断。一张桌上写学术著作，一张桌写文艺作品。他从来不以为苦，只以为乐。陪伴他的就是那两只波斯猫，有一只正在书桌上睡着，我们惊动了它，窜出去寻它的主人也是朋友去了。

在另一间书房里，书山下有一张条桌，也放了许多书，李教授说这是季老查阅资料之处。在这里李教授讲了一个故事，她说这里只能容下一张条桌，所以当国家领导人来看望季老时，连凳子都没有一个，只能站着说话。李教授说，正因如此，才有我们刚才和季老谈话的接待室的设置和装修。那接待室虽然不大，却焕然一新，有新装的地板，还摆了成套的沙发，圆茶几和插着鲜花的花瓶，如此等等，都是上了档次的。我对季老取笑说是蒙天恩眷顾了，季老不言也不笑，好像对这样的事漠不关心，根本进不了他的话题。我再坐一会便告辞了。

我回到女儿家，等了不过一个多星期，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副社长带着编辑来访问我。开门见山地说，她们只花了一个

星期便审读完我的稿本，很好，他们出版社决定马上出版。这太叫我高兴了，她们把准备好的出版合同拿出来让我签字，我马上就签了。他们以特有的高效率出版了这本书，两个月之后就给我寄来样书，他们说首印8000册，还是用防盗版的纸印的。

《沧桑十年》能够出版，除季老为我写序外，还做了什么帮助，他是不会告诉我的，但是我一定要去向他道谢。欣喜之余，我还乘诗兴写了三首七律诗，冒昧写成条幅带去送他。我女儿陪我去了，我向季老道谢，并拿出条幅展开，请方家指正。他有兴趣地读我写的诗。诗题是《访季羨林老》，其一：“荷塘雨霁柳迎风，朗润幽园访季翁。鲁酒齐歌堪自得，东文西学贯而通。谈锋似剑鞭辟里，清议如流发聩聋。且向书山深处去，雕章琢字乐融融”。其二：“京华到处说《牛棚》，绿涨池塘访季翁。斗室开光蒙特眷，书斋转折似迷宫。回眸痛说十年劫，皓首仍穷百代功。最是可怜双白狸，案头几上慰龙钟。”其三：“闻名久矣季文师，晚岁识荆大悔迟。学广功深人尽仰，高风亮节众咸仪。《牛棚杂忆》君前导，空谷足音我后随。到老春蚕丝未尽，南山东海寿期颐。”

季老是诗词行家，他读了竟谬加称赞，说应该装裱起来。我们聊了一会，不敢多占他的时间，向他再度表示感谢，告辞出门，他却坚持送我出门，出了门后，他还在湖边走了一段，送到车边，我的感慨之情，真是无以名状了。2005年我到中国作协开会，听说季老病了，住在301医院。但是在医院还坚持写作。我想去看望

他，作协陈建功副主席和我一块去了。相见甚欢，果然见他在病房里摆上一张小桌，还在伏案写作。桌上堆放书报，可见他正在争分夺秒地读书写作。我们都说这样不好，他却满不在乎。我拿出我写好“悠着点”的一幅字送给他，劝他要服老，我们都老了，要悠着点。我们两个用手牵起这幅字，照了一张像（如前图）。我把我新出版的《文集》送他后，我们告辞出来，都说他不会悠着点的，不然就不是季羨林大师。果然他把他的文丝吐尽，才终于走了。

和季羨林大师同一天走的还有一位大师，就是任继愈。任继愈大师和我也有一点来往。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他和我都在昆明西南联大上学，不过他是我的学长，他已经在读研究生，我在读中文系本科。他专攻哲学，成绩斐然。后来读了他出版的简本《中国哲学史》，才得知他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很有成就的学者。他的《中国哲学史》，洋洋四大卷，真大观也。我国对于宗教缺乏研究，甚至有偏见，他却独有远见，很重视对宗教的研究，听说受到毛主席的称赞，是著名的宗教学家，他特别注意对佛教的研究，出版有《中国佛教史》八卷。他还四次注译《老子》，不厌其烦，精益求精，在学术界创导一种严谨的学风。至于他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重任，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晚年勇挑中国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领导工作，推进国学，厥功甚伟，学术界有口皆碑，无庸赘述了。

我和任继愈虽是同学，都读文科，专业不同，往来不多，只在西南联大校友会

□ 怀念师友

上有所接触，也非深交。我们真正展开心扉，交流思想的是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扩大会上。我因曾参加四川古籍整理规划工作，也参加了此会。在会上相见，谈到西南联大的优良学风时，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都留恋西南联大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的民主科学的学风和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治学精神，而感慨不已。他虽身处并不理想的学术研究环境，甚至身处逆境，还是矢志于学，锲而不舍，卓有成就。

此后我们逢年互送贺卡，再无往来，只是我送他一套我的《文集》，他去年送我他的新著。今年2月，我忽然收到他的来信，一封长达两千字的长信。我拜读之后，真如醍醐灌顶。其实这是一篇高水平的论文提纲。除了开头告诉我他去年患膀胱癌动手术及术后情况外，他谈了许多问题。学术问题，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如此等等，都有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独到见解，发人深省。有些一语道破的隽语，是我过去从他发表的文章中从未见到的，真好像是他大走以前对老朋友说的心底话，使我大开脑筋。我不愿私藏，把它转录于下。我想这不仅对学术研究有好处，也许对研究任继愈这位大师也有参考价值吧。我引为终生遗憾的是，我正在研读他的来信，经过思考，要回他一封长信。他比我还小两岁，却突然先我而去了，伤哉！

下面便是任继愈给我的信：

识途学长：

很长时间没有与你联系，祈谅。

去年5月底动了一次手术，切除了长在膀胱内的一个肿瘤。手术成功，医生也满意。本来不想动手术，因为年纪过了

九十岁担风险。我下了决心，切除“那在肿瘤不好切除连膀胱也切去，也可以装个人工尿袋也可以”。反正我不做更多活动，只希望把经手的未了的工作结束了，足矣。手术后近多半年，只是恢复起来比青年人要费时费力。一些老朋友间也缺少联系。一般贺卡别人代劳也打发了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处不说明情况实在是失礼。在北京我未发现生病症之前，有时与汪子嵩同志见见面，手术后，两人也常通电话，他的老伴患病要人守护，子嵩也离不开家。

在病中，思想并未休息，我们经历了新旧两个中国，新中国又经历了知识分子改造，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经常思考这些举世瞩目的大变革，何以战时全民遭劫难，受重大伤亡。建国60年来，前30年仍然遭劫难而造成重大伤亡。迄今为止，我们的《抗战史》不完整，也不全面，比抗日战争更长的“文化大革命”，连一部《文化大革命史》也没有写出来。有几本也很不完整。

我们都是研究历史的，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有人认为中国当初革命就走错了，如果不革命，走变法立宪道路就好了。又有人说五四疑古疑错了。也有人说中国革命投错了路，走议会道路北欧也是一个方向。

我认为我们党是以小农为基本成员的党，有马克思主义，但仍是封建思想占主要地位。人民群众乱中望治，希望有圣君贤相为人民做主，拯救万民，“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造神”运动。神是人造的，人们需要神，神才存在；人民不需要神，有人野心，想当神也当不成。国际

怀念师友 □

歌：“不靠神仙皇帝”，我们全党歌唱“大救星”。这是党不成熟的表现。欧洲社会走出几千年封建社会，走了四百年才走完的路，我们要在几十年内走完，不走弯路是不可能的。只是革命领导人带着走，大家（我们也在内）紧跟，推波助澜，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人们投鼠忌器，想保住“红旗”不倒，越想把罪恶算在“四人帮”的帐上，这种办法并不成功。人们心中都有一本帐，四个小人物如何把中国搅乱了十年。照搬外国经验，都失败了。

中国人要走什么路仍在进一步探索中。进入小康社会有人均收入的经济指标，但没有政治文化的指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有了钱也不能算社会主义。鲁迅说过，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很多问题是温饱后才会发生的。这一方面应当好好研究透彻。

孙中山是不朽的，从他以后没有人敢当皇帝。

毛泽东是不朽的，他取消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统一了全国（除台湾），创建了康熙、乾隆以来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多年的旧知识分子，解放后又学了马克思主义。我认为文化是有民族性，又有继承性的。由于它有民族性，德法相邻，鸡犬之声相闻，但两国的文化，哲学不同。英国、德国与法国只隔一道海峡，文化哲学也不同。我们应当走自己的路，有一部结合中国历史实际，体现中国特色的哲学史。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际是“多民族，统一的大国”（秦汉以后到今天）。根据这“实际”来再看五千年的历史，才是可行的探索之

路。建国60年最大的文化失误是切断文化传统，对旧的文化要彻底决裂。事实上，想决裂也决裂不了。谭厚兰等打破了孔庙的石碑，但没有清除头脑的封建帝王思想。

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几千年的好传统，是关心“天下兴亡”（古人的天下是国家而不是世界）。新中国成立，国家已能立足，有工作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西南联大的师长们），都有爱国主义传统。西南联大师生中，有左有右，但无论左右，抗日救亡的认识是相同的。在艰难生活中志气不衰，也靠这种优良传统。历次运动中首先挨批判的，改造的也是他们。他们（我的老师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站起来了，不再受奴役了，他们受批判，受委屈无怨无悔。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钱穆，闻一多和李广田等等。

中国56个民族，但中国区别民族（夷夏）不是看血统而是看他们是不是接受中华文化的华夏人。隋唐皇帝家族都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混血儿，他们没被看作“异族”。金元西夏都接受了华夏文化，他们被认为华夏不是夷狄。不接受华夏文化的是夷狄。所以中国二十四史是后来朝代承认前朝的政统。因为文化价值观都接受“忠孝”传统，“敬天法祖”。几千年文化连续不断，中国是在全世界唯一的国家，既“古”又“新”。

随手写来，拉杂不成文。我想中国哲学史要重新写。

此致

敬礼

任继愈

2009. 2. 13